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敦煌文獻叢考

許建平 著



中華書局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敦煌文獻叢考

許建平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文獻叢考/許建平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7-101-05012-3

I. 敦… II. 許… III. 敦煌學-文獻-研究-文集
IV. 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59922 號

-
- | | |
|------|---|
| 書名 | 敦煌文獻叢考 |
| 叢書名 |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 著者 | 許建平 |
| 責任編輯 | 李解民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 |
| |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
| | http://www.zhbc.com.cn |
| |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
| 版次 |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
| |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規格 |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
| | 印張 12¼ 字數 300 千字 |
| 印數 | 1-3000 冊 |
| 國際書號 | ISBN 7-101-05012-3/K·2179 |
| 定價 | 28.00 元 |
-



許建平，1963年生，浙江慈溪人。1985年畢業于杭州大學歷史系，1987年畢業于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獲文學碩士學位。1987年至1994年在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1994年5月起在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今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任教。現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生，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總 序

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是由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創建和發展起來的,1983年經教育部批准成立。首任所長爲姜亮夫先生,副所長爲徐規先生和平慧善先生。後來先後主持工作的有崔富章先生、龔延明先生。在這些老所長的苦心經營下,在全所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本所現已成爲海內外有較大影響的傳統文化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現全所設有先秦文獻、中古語言文獻、敦煌學、宋學四個研究室;有教授、博士生導師11人(其中4人係兼任),副教授5人,講師1人,其中有二人被評爲浙江省特級專家;55歲以下的研究人員中除1人在讀博士外,其餘均有博士學位(其中2人爲博士後)。此外,還有博士後研究人員6人。1983、1984年,本所所屬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先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權,20多年來共培養碩士研究生68人、博士研究生59人(另外博士後出站13人)。這些畢業生基礎扎實,知識全面,受到用人單位的好評,如陳戍國、陳利器、劉躍進、傅傑、黃微等及留在本所工作的一些中青年教授。目前在讀的碩士研究生有16人、博士研究生有31人。本所教師近年來承擔了《敦煌文獻合集》、《中國歷代登科總錄》、《楚辭學研究叢書》、《中國經學文化史》、《孫詒讓全集》等一些國家和教育部的重大科研項目;出版學術著作近百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語文》、《文史》等重要刊物發表論文700多篇;獲省部級以上獎

勵 30 多項，其中有首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 1 項，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 2 項、二等獎 2 項、三等獎 2 項，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 2 項、二等獎 2 項，中國社科院胡繩青年學術獎 1 項，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三等獎 3 項，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3 項，浙江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 4 項，獲教育部青年教師獎和中國優秀博士後榮譽稱號各一人次。1994 年，本所和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聯合申報的漢語史（含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被評為浙江省重點學科；2000 年、2004 年，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繼續被評為浙江省重點學科；1999 年 12 月，本所部分教師參與組建的漢語史研究中心被評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本所融文史兩大學科的研究力量於一體，注重以語言文字研究為基礎的傳統文化研究，呈現出專精和博大的治學特色。其中在許多研究領域，如三禮經學研究、楚辭學研究、職官科舉制度研究、朱熹研究、敦煌學研究、中古漢語研究，都處在海內外研究的前列。

為了紀念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本所學術委員會決定編選一本紀念文集，並編輯一套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前者已由中華書局在 2003 年出版。現在呈獻給讀者的是叢書系列。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本所的專任教師，他們中既有久享盛譽的老前輩，也有成就卓著的中年學者，還有已在儕輩中嶄露頭角的學術新銳。本叢書的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本所的研究實力和本所二十年走過的歷史軌迹，也是對本所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成績的一次檢閱。

此時此刻，我們深深懷念本所的創始人姜亮夫先生以及劉操南先生、郭在貽先生，並向為本所的創立和發展作出貢獻

的已經離退休的和已經調離本所的老師表示深深的敬意，向長期以來一直關心、支持本所建設的各級領導——尤其是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和學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謝。中華書局是與我所聯繫十分密切的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出版機構，這次又慨然承諾本叢書的出版，謹此也表示我們誠摯的敬意和謝意。

榮譽已經屬於過去，新的業績有待於來者。我們兩個這幾年主持所務的晚輩，面對老一輩開創的基業，心裏總是感到沉甸甸的。但我們相信，有各級領導的支持，有全所師生的共同努力，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一定會有一個更輝煌的未來。

張涌泉 王雲路
乙酉年歲末於杭州

序

許建平同志是近年來敦煌學領域涌現出來的又一位新秀，多年來他在敦煌經部文獻的研究上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論著就是其研究成果的結晶，讀後使人深感敦煌學研究後繼有人，對敦煌學的明天充滿了信心與希望。許建平研究的成功除了自身不懈的努力之外，浙江大學敦煌學研究深厚的底蘊也是其成功的基礎。這裏曾經有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等老一輩著名敦煌學家，也有張涌泉等一批中年學術骨幹。

我畢業留校工作以後有幸來到杭州大學進修，至今記憶猶深。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全國學術討論會決定1983年9月在杭州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舉辦第一屆敦煌學講習班，我同杜斗城、唐景福、孫爾康、翟建波、王永增、汪泛舟等一批蘭州的中青年教師來到風景秀麗的西子湖畔，聆聽了姜亮夫、蔣禮鴻、王伯敏、郭在貽等先生的授課。當時姜亮夫先生身體不好，前後祇和我們見過兩次面，一次是在開學典禮上，一次是為我們講課。當時的開學典禮搞得很隆重，校長出面，姜亮夫先生講了話，談到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情緒很激動，會後就住進了醫院，差不多一個多月時間。姜先生住院期間，由蔣禮鴻先生給我們講課，主要內容是他編著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蔣先生氣管不好，所以隨身總帶着一個小巧玲瓏的痰盒，有煙灰碟大小，

一身書卷氣，操着一口濃重的江浙話，講起課來不緊不慢，有條有理。王伯敏先生爲我們講了中國畫的歷史，因爲當時我對藝術史不是很在行，所以聽起課來總是暈暈乎乎，雲裏霧裏。而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還是姜亮夫先生的課，好不容易等到姜先生可以講課了，又因講課過於激動再次住進了醫院。姜亮夫先生授課非常投入，聽他的課既是接受知識也是美的享受，特別是當講到他對“對鏡貼花黃”、吳彩鸞書《切韻》的研究時，繪聲繪色，神色飛揚，使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後來爲了姜先生身體起見，不再直接授課，我們每周聽兩次姜先生的講課錄音，然後根據錄音將姜先生的講課稿子整理出來（後來出版爲《敦煌學概論》）。在姜先生兩次住院期間，講習班的成員分兩隊，東南地區的學員到敦煌考察，從西北及部分北方來的學員考察蘇浙皖地區的佛教遺迹。這期間我巡禮了紹興、寧波、蘇州、無錫、天台山、普陀山、九華山等處佛教聖迹，瞻仰了地藏菩薩肉身像。在這樣濃鬱氣氛中從事研究，耳濡目染，收獲當然很大。我們在杭州大學訪學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留下的印象却很深，我從事敦煌文獻研究的底子基本上是那個時候打下的。

我留校工作因爲與系上有約定，不能調走和考研，所以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出去進修。在工作的最初五年裏，三年多都在外學習。杭州大學是進修敦煌學的第二站，在此之前我還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研修，之後又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進修了一年，後來我從事敦煌文獻、敦煌史地研究很多得益於這些訪學經歷。許建平同志在這樣優越的學術環境中從事研究，不能不讓人羨慕。他在經學上的造詣和在敦煌經部文獻研究上的突出貢獻，很

大程度上也得益於這種深厚學術氛圍的熏陶。

今天雖然杭州大學已與浙江大學合併，三位敦煌學巨匠亦已僊逝，但是浙江大學的敦煌學研究在張涌泉教授的領導下，發展之強勁仍不減當年。敦煌經部文獻整理和語言文字研究是浙江大學的特色，許建平同志是經部文獻整理研究課題組的骨幹，從他的研究論著中透露出一股老一代敦煌學家留下來的深厚學術底蘊。

敦煌文獻研究是敦煌學研究的基礎，也是最艱難的部分，出成果非常慢。特別是經部文獻的研究，沒有真功夫是不行的。記得我在1990年前後從事敦煌碑銘讀文書的研究，發現學術界部分研究者將王重民先生定名正確的P.4621號寫經跋文錯定為《周忠孝墓志銘》，我在敦煌文獻中找到了它的另外一個抄本，認為是《武則天為父母抄寫妙法蓮華經發願文》，在論文《敦煌碑銘讀三篇證誤與考釋》中公佈了這一看法。後來在俄藏敦煌文獻中見到了它的又一個抄本Дх. 06041、Дх. 06042號。今年夏季北京理工大學趙和平教授來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講學，交談中他說找到一篇將發願文與《妙法蓮華經》連抄的P. 3788《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以此為基礎並與敦煌唐代宮廷寫經結合起來，準備寫一篇武則天與敦煌佛教的論文，為之他還作了一次武則天與敦煌佛教的講座。這些文獻揭示了敦煌唐代寫經來源的原因，證實了武則天為父母敬造三千部《妙法蓮華經》的活動是真實的，這三千部經基本上分賜到了全國各個寺院，作為唐敦煌地區的小寺三界寺也得到了這些宮廷寫經，可以看出武則天對敦煌佛教產生的巨大影響。從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文獻的研究對其他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和價值。許建平同志的經部文獻研究，同樣對

敦煌區域史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吐蕃佔領敦煌之後，對敦煌地區的漢文化打擊很大，作為漢文化傳播的主渠道州學和縣學都廢除了，漢文化傳播僅僅微弱地保留在寺學教學及私家傳授。張議潮收復敦煌並建立歸義軍之後，不僅僅重建了唐代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同時在文化建設上也有很多作為；不僅僅唐代的教育制度被重新建立起來，同時吐蕃時期傳播漢文化起到很大作用的寺院學校教育制度也得到沿襲。在歸義軍政權的主持下，編輯了很多與文化教育有關的典籍，我們看到的各種略出本典籍就是這個時期敦煌文人學士刪節其他作品而成的新作。如張景球的《略出本羈金》、張敖的《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和佚名的《新集吉凶書儀》、《新集文詞教林》、《新集文詞九經抄》、《新集書儀》、《新集雜別紙》、《新集嚴父教》、《新集兩親家接客值日時景儀》、《新集時用要字》、《新集備急灸經》、《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新集周公解夢書》和《略出本春秋後語》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名作，從這些資料看，歸義軍時期對敦煌文化的重建是全方位的。作為漢文化的中心部分經部文獻，在歸義軍政權的漢文化重建活動中起的作用更大，我們從敦煌經部文獻抄寫題記中看到，當時不僅僅州學和縣學教學使用經部文獻，就是寺學生徒也以儒家經典作為學習資料。因此研究敦煌經部文獻的價值不僅僅在文獻校勘和整理上，而且對敦煌區域史的研究價值同樣很高。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許建平的研究論著和作為後續研究的博士論文中得到證實。

許建平同志前不久加盟蘭州大學敦煌學專業，他的到來一方面為蘭州大學敦煌學專業補充了新鮮血液，另外一方面也加強了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的合作研究。浙江大學敦煌學

研究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特別是在文學、文字學和經部文獻研究方便，有着悠久的學術傳承。而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得到國家各方面的支持，1998 年成為敦煌學博士學位授權點，1999 年建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3 年建成人事部敦煌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先後得到國家 985、211 工程和教育部基地經費及各種專案經費約 1400 萬元，在科學研究、學術交流、人才培養、條件建設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發展，有無可替代的地緣優勢。雙方合作，東西加盟，可以形成優勢互補，將在敦煌學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績。

敦煌寫本經部文獻的整理研究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有很多問題值得研究，因此對許建平來說任重而道遠，祇要深入下去，一定能作出卓著的成績。

鄭炳林

2005 年 11 月於蘭州大學

目 錄

序	1
敦煌本《尚書》叙錄	1
BD14681《尚書》殘卷考辨	23
北敦 14681 號《尚書》殘卷的抄寫時代及其版本來源	
——與王煦華先生商榷	65
敦煌出土《尚書》寫卷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75
敦煌《詩經》卷子研讀割記二則	105
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詩經》寫卷	116
法藏敦煌《毛詩音》“又音”考	138
潘重規先生對《詩經》研究的貢獻	162
唐寫本《禮記音》著作時代考	179
唐寫本《禮記音》所見方音考	199
《禮記音》補校	204
BD09523《禮記音義》殘卷跋	214
北圖藏殷 42《論語音義》殘卷跋	231
《春秋後語釋文》校讀記	235
伯三六〇二殘卷作者考	243
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證	258

《殘類書》所引《劉子》殘卷考略·····	287
殘卷定名正補·····	296
英倫法京所藏敦煌寫本殘片八種之定名並校錄·····	312
《俄藏敦煌文獻》儒家經典類寫本的定名與綴合	
——以第 11—17 冊未定名殘片為重點·····	332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未刊敦煌寫本殘片四種的 定名與綴合·····	356
後記·····	373

敦煌本《尚書》叙錄

我國歷史上有幾次對中國文獻的重大發現，其中與儒家經典有重大關係的是漢之孔壁古文及清末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之敦煌殘卷。而藏經洞中之儒家經典“大概以《尚書》隸古定本的發現為最重要”^①。敦煌本《尚書》殘卷一面世，即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早在民國初，即有羅振玉、王仁俊、蔣斧、吳承仕、吳士鑑、馬叙倫、伯希和等對《尚書·顧命》、《尚書釋文》等殘卷的研究。以後，衆多學者專意於此，迄今不下數十人。其中陳鐵凡的成就最大，對《尚書》殘卷的研究也最為全面。由於敦煌所見均為殘卷，因而要對《尚書》殘卷進行研究，首先就得對殘卷作收集、考訂。前輩學者在此已經化費了大量的精力，其中收錄較勤的主要有王重民、顧頡剛、姜亮夫、顧廷龍、陳鐵凡等。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錄》收錄 23 號殘卷^②。姜亮夫《敦煌本尚書校錄》，文前有所校殘卷之叙錄^③，計 15

① 姜亮夫《敦煌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9。

② 《敦煌古籍叙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8～26。後簡稱《叙錄》。

③ 《敦煌本尚書校錄》，姜亮夫《敦煌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51～162。

號,其中 P. 3311《刊定尚書正義銜名卷》,實為《春秋正義銜名》,則所收實為 14 號。陳鐵凡《敦煌本易書詩考略》收入 34 個卷號^①,其中 P. 2549、P. 4900、P. 3605、P. 5522、P. 4033、P. 5557、P. 3871、P. 5543 諸卷並沒有見到殘卷的具體內容。吳福熙《敦煌殘卷古文尚書校注》^②雖晚出,然僅收錄 27 個卷號。《尚書文字合編》^③收錄 37 號。劉起鈞《尚書源流及傳本考》對敦煌本《尚書》的卷號亦有提及,凡 31 號^④。今匯集前人所獲,加上自己所得,共得殘卷 47 號,包括伯希和編號 25 種、斯坦因編號 12 種、俄敦編號 1 種、北敦編號 1 種、吐魯番文書 3 種、和闐本 1 種、碎片 2 種、《經典釋文·尚書音義》2 種。《尚書》58 篇,殘卷涉及者已有 34 篇,其內容佔全書的 43%;其中完整的篇目有 22 篇,佔全書篇目的 67%。茲綜合前人說法,參以己見,為所獲《尚書》諸殘卷作叙錄,略述殘卷的完缺情況、定名依據、綴合情況與理由以及前人對之所作的考證之得失。在作叙錄之前,先要着重說明幾個問題。

一、經學上所云之《尚書》,主要有三種。一為漢初伏生所傳之 28 篇今文《尚書》;二為漢景帝時得之於孔宅之孔壁古文《尚書》;三即東晉時梅賾所獻之 58 篇偽《古文尚書》。孔壁古文到東晉時失傳。今通行之《尚書》即梅氏所獻偽《古文尚

① 《孔孟學報》第 17 期,1969 年 4 月,頁 153~170。

② 《敦煌殘卷古文尚書校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③ 顧頡剛、顧廷龍主編《尚書文字合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④ 《尚書源流及傳本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11~216。

書》，伏生之今文《尚書》已收入其中，但已將 28 篇拆分爲 33 篇。以上是經學史上所云今古文《尚書》之別。梅氏所獻僞《古文尚書》，因爲了取信於人，表明自己是真古董，是用一種隸古定字體寫成的^①。唐玄宗天寶三載（744），詔衛包改隸古定字體爲楷書字體，因而僞《古文尚書》又有古文與今文之別。今通行之《尚書》即衛包改字本。爲與經學上之今古文相區別，今將隸古定本稱爲古字本，衛包改字後之楷字本稱爲今字本。

二、關於敦煌殘卷之抄寫年代，前人多有考證，但大多是據避諱字而定。而實際上敦煌殘卷的避諱問題甚爲複雜，僅依諱字定書寫年代，很難謂其必是。如 P. 2617《周易經典釋文》，卷尾題記明記其寫於開元廿六年，然卷中竟出現“隆墀”字樣。蓋因敦煌僻處西陲，王命難達，且草野小民，於禮不謹，致避諱不嚴。故考證寫卷時代，若能以諱字、紙色、筆迹等因素綜合考慮，則或能無失。又天寶三載衛包改字，因而大家常常以古字《尚書》爲天寶前寫本，其實這種說法也是比較危險的，如 P. 2643 爲古字《尚書》，但題記云是乾元二年（759）所抄，距天寶三載改字已有十五年之多。因而本文以爲論定《尚書》殘卷之時代，若無比較有力的證據，則不以避諱字或古字、今字的區別來定，通以之爲唐寫本，較爲妥當。今在文中仍收入前人對殘卷的抄寫時代判斷，但不作爲筆者的意見，僅是爲大家提供一種說法而已。

三、在敦煌吐魯番本《尚書》殘卷中，除了 P. 4900《尚書

^① 關於這種隸古字，今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僞造的；一說是前有所承，許多是取自《說文》重文及三體石經。